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

Martin Luther King, 1963

Copyright 2018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博物館與社群何干？談博物館、文化¹與公眾

丁穎茵

香港需要博物館嗎？

香港快將迎來博物館新時代……

自 2015 年，「香港歷史博物館」已就常設展覽「香港故事」的更新，向青年團體、教育界人士以及傷健組織等持份者進行諮詢。

2018 年 3 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宣佈成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限公司董事局」，負責制定博物館的願景、使命以及策展與營運等策略。

2019 年，「香港藝術館」將重開大門，藉由藝術訴說香港故事。

緊接其後，即將開幕的「M+ 視覺文化博物館」提出以跨學科的視野檢視二十及二十一世紀視覺文化，思考此時此地的景況。

圖一

利物浦國際奴役博物館
(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自由牆」。
牆上刻字：「自由從來
不會是壓迫者的恩賜，
而是來自被壓迫者的爭
取。」(馬丁·路德·金，
1963)]

1 一般而言，「文化」指人類自我發展所累積的生活方式，包括了歷史、科學、藝術等知識領域，也同樣寄托了情感表現、人際關係規範與物質享受。文化評論學者 Terry Eagleton 指出文化既可視為人類發展的現象，同時也有其自省機制促成人類改變現狀，推動更美好的未來 (2000: 28-31, 130-132)。因此，「文化」不但指不同知識領域，也指促成行動實踐的思考。筆者採用「文化」一詞，意在標明博物館成立的宗旨在於整理社會對其過去的反思，建構當下對文化的理解，從而推動社會轉變的行動。

未來十年間，博物館——不論新落成抑或扎根多時的——均試圖以展覽、教育活動及出版等形式開拓觀眾對文化的想像。對這番新局面，香港人也似乎有所期待。根據官方統計報告，公共博物館於 2000 年錄得參觀人數約 340 萬，2006 年增至 435 萬人，至 2013 年，參觀者更逾 613 萬，當中大多數參觀者對博物館的服務表示滿意（審計署 2006：15、博物館委員會 2007 年：14、立法會 2017：4）。

各家博物館的發展策略與參觀者數據確實亮麗，但不少研究報告同時指出博物館展覽與活動似乎未有緊扣市民大眾的生活脈搏，難以發揮文化的潛力（博物館委員會 2007 年、團結香港基金會 2016 年）。事實上，參觀人數多寡絕非衡量博物館績效的可靠指標。對於如何評估博物館的工作，不少學者批評數據計量往往只著重參觀者人數與舉辦活動的次數，忽略參觀者的經驗與活動本身的價值，反倒令文博機構忘卻其願景與使命（Selwood 2002、Jowell 2004、Holden 2004）。² 就筆者曾參與的博物館觀眾經驗訪談來說，逾半受訪者對其參觀表示滿意，原因在於人流不高、空間寬敞，可以隨意閒逛（Ting & Watts 2014）。其中有人更直言：「這個場幾好呀，多嘢睇（編按：廣東話，指目不暇給），入場費又唔（不）貴，比很多商場好多了」（觀眾訪談：2013 年 1 月 9 日）。這說明觀眾不一定會分辨博物館展覽和商場藝術展，更無從理解博物館的願景與使命；其觀展經驗又往往局限於即時觀感，加上傳媒大多吹捧藝術創意為個人感受，疏於剖析文化脈絡與藝術語言，令文化淪為優皮一族有品味的玩樂消遣，無法引起討論與思考。對香港人來說，博物館份屬小眾趣味。十多間公共博物館的「優遊博物館」臉書專頁，只得五萬多人關注，而香港歷史博物館的臉書社群就更只有一千多人。在一篇訪談中，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談及該館的未來新方向時，更提到有市民表示從來沒有聽說過藝術館，反映文博機構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遠距離（吳世寧 2016）。

筆者相信更多有關博物館的討論，有助推動社會對於文博機構的理解，從而促進館方與社群的互動，共同思考我們需要什麼類型的博物館。以下將介紹兩個博物館計劃，並從知識建構與社群參與兩方面，討論博物館如何以文化提昇公眾的生活質素。這些個案旨在拋磚引玉，思考博物館如何回應當代社會需要，而非主張機構必須做什麼、怎麼做。畢竟，「博物館」本來就自歐洲移植至香港，亦步亦趨的模仿，無助博物館植根於本土以至連結當代社群。

² 為求合理衡量博物館的價值，曾出任澳洲博物館協會（Museums Australia）主席的 Carol Scott 仔細分析價值的不同面向，包括：一、機構本身的價值，亦即博物館如何透過其展覽與活動促進觀眾對文化的理解，鼓勵他們參與其中的討論，並且與他人分享自己對文化的所思所感；二、活動的工具價值，藉以考察博物館活動如何協助個人的知性成長、如何提昇社區凝聚力、建立社群資本，由此推動文化旅遊的收益；三、文化的本質價值，著眼於參觀者藉由博物館的互動而得到啟發、體驗與反思，促使個人與地方文化的連結，投入不同的文化實踐（2006）。

博物館如何分享知識？

過去，博物館一直被視為知識殿堂，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教育大眾。透過蒐藏、研究與展示，博物館建立了一套分門別類的知識系統，借助特定學術框架（如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史學，等等），按不同器物的製作年代、流佈地域及形態特徵，條理分明的編配人類文明的演變過程（Pearce 1992：99–101）。成立於 1753 年，大英博物館奠基於當時以器物建構知識、以知識整頓世界面貌的雄心（Wilson 2002：56–57）。在約 1756 年，首任館長 Gowin Knight 即明言發掘知識乃推動社會進步的關鍵：

籌建大英博物館的方針在於為有識之士提供研究所需，鼓勵學風，以祈拓展不同知識領域，推動文明進步，有益於社會大眾，彰顯國家榮耀（轉引自 Cash 2002: 29）。

繼承了啟蒙時代對理性與秩序的推崇，大英博物館將混雜紛繁又深奧艱澀的「世界文化」演繹成可見可感又條理分明的展示，呈現出百科全書式的「人類文明觀」。透過分門別類，博物館把器物從原來的文化脈絡抽離，重置於不同學術框架，用以檢視人類與周遭世界的關係。新知識由此而建構，參觀者亦得以認識不同時空的器物，從而思考文明演化的軌跡，甚至自身於世界的位置。耐人尋味的是，大英博物館自詡為一座「環球博物館」（World Museum），但卻直至 1851 年，方著意投放資源收藏英國及歐洲中古文物。歷史學者 Craig Clunas 認為當時館方絕不可能僅止於收藏英國器物，因為這就等同對帝國權力設限（1998：43）。知識即力量。此收藏政策表明知識是整理人類文明演變的詮釋權，也是比較不同文明高下的話語權。十八、十九世紀正值英國殖民擴張的巔峰，掌握不同文化的知識除了關乎學術追求，更著重找出管治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實際方案。當時參觀博物館的訪客由此一窺世界文明的不同面貌，其滿足感來自增進知識，也少不了一份「日不落帝國」的民族自豪。

及至二十、二十一世紀，殖民地逐一脫離英國，大英博物館屢屢被指斥館藏隱藏著帝國侵略的殘酷與狡詐。例如 1801 至 1805 年間，英國駐希臘大使第七代額爾金伯爵湯瑪斯·布魯斯（Thomas Bruce）聲稱取得當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許可，從雅典巴特農神廟巧奪了不少銘文與石雕（Jenkins 2008：209–210）。1897 年，古貝寧帝國（Benin Empire，今尼日利亞南部）因貿易爭拗而為英國所吞佔，三千多件宮廷銅器被併入大英博物館（Jenkins 2008：138–142）。近幾十年來，大英博物館無法迴避面對非法掠奪文物的醜聞，左支右拙地應付各國追討文物回歸的申訴。

回顧殖民歷史，不少學者批評博物館必須以區別他者來呈現自身文化的優越感，建構的知識貌似客觀，實質將其價值判斷強行加諸其他文化（Simpson 2001，Duthie 2011）。自 1990 年代始，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 的視野漸次擴展，在維護與研究館藏之餘，更著重如何隨社會文化的變化而更新對館藏的詮釋、以及如何與當代社群對話 (Stam 1993、Witcomb 2003)。如 2006 年，國際博物館議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倡議：

從社群蒐集館藏並加以運用時，博物館必須建基於其對人類尊嚴，以及對館藏所處的文化及傳統的尊重。透過鼓吹多元社會、多元文化及多種語言的論述，館藏必須用於促進人類福祉、社會發展、對他人的包容及尊重 (2006：6.7)。

千百年來，人類按需要、慾望與品味創造出五花八門的器物，反映了製作技術、生活訴求與歷史情態。博物館藏品各有來歷，正好與觀眾一同思考何謂身份認同、個人如何與社會以至全球有所聯繫。即使藏品未必直接牽動觀眾的想像，博物館必須發掘其當代意義，促成物與人的對話，鼓勵大家藉以反思目前的處境。換言之，大英博物館坐擁八百多萬件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就得回答：這些器物講述了誰的文明故事？這些知識與當代有何關連？觀眾從中又得到什麼啟發？

2004 年，大英博物館時任館長 Neil MacGregor 在報章撰文表示，世界各地耳聞目睹的衝突、壓迫與不義，往往來自偏狹的族群身份與非此即彼的成見。回應時代的紛亂，他認為與其大談文明衝突，倒不如思考文明的共通點——不同社群如何交流、如何互相借鑑、如何和平共處。大英博物館的責任就在於探索萬千器物的歷史流變，比較地域、文化脈絡與社會背景的異同，邀請觀眾以環球視野思考身邊發生的事情，以求拓闊固有的想法、包容多元聲音 (MacGregor 2004)。他的觀點正好說明博物館所累積的知識既非晦澀無趣的資料，更不是永垂不朽的真理，而是繁雜多元、因時因人因地而變的論述。博物館必須面對公眾，其追求的知識包含著學術研究的專精、當代的人文關懷，也強調與人分享、引發討論的技藝。2010 年，MacGregor 主持的「世界歷史百物誌」(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計劃，正好闡釋大英博物館如何建構知識、以及如何與公眾分享。³

回顧二百萬年來人類文明的進程，MacGregor 與百多位館內專家、四百位不同領域的學者敲定百物誌的內容，最終按年代以「權力與哲學」、「儀式與信仰」、「貿易與侵略」等主題討論人類如何塑造自我、發展文明。每件器物要麼析述了人類求生、求生存、求享受生命，甚而尋求其中意義的方式；要麼考究技術與知識四處流轉的路徑，從而追溯人類如何探索周遭環境、接觸其他社群。

3 是項計劃本為大英博物館與英國廣播公司合力製作的電台節目。由於節目廣受歡迎，MacGregor 將內容結集成書，大英博物館又製作相應的教學網站 (<http://www.teachinghistory100.org/>)；展覽項目亦巡迴至日本、阿聯酋、澳洲、中國等地。由於計劃從電台節目演變為讀本、展覽，載體不同，百物表單也略有不同。下文討論以電台節目的內容為本。

如歐都外 (Olduvai) 手斧證實了不分種族的智人 (Homo Sapiens) 都本源於非洲大陸 (MacGregor 2010a)；公元前 263 年，印度阿育王控制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大片領地，其圓柱敕令不談王朝榮耀，卻大力提倡尊重與包容不同宗教信仰 (MacGregor 2010b)；於敘利亞出土的聖海德薇 (Saint Hedwig) 大酒杯說明中世紀教會鼓勵女性參與公益事務的歷史，其流散又揭出十字軍東征所帶動的商貿路線 (MacGregor 2010c)。無論器物源於何時何地，大英博物館不但從其本來脈絡探究其時代意義，更著力追溯其流傳於世的經歷，以引證文明之間時而相爭相鬥、時而相通相融的複雜現象。

百物誌羅列了藝術傑作，也包攬大量生產的工業製品，以求呈現上至皇侯權貴、下及勞動黎民的生活——亦即人類經驗的多元面貌。例如來自當代世界的第一百件物件，即為深圳出產的太陽能燈具與充電組。MacGregor 指出全球逾十六億人的居所沒有電力供應，價格低廉的太陽能燈具與充電組讓他們將陽光轉化為能源，將電爐、電水泵、電燈、電視與電腦等設備帶到家居，供應生活所需。便利又環保的科技產品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太陽能發電為整個社區提供照明系統，為孩子爭取到晚間學習的時間，也為更多女性爭取到接駁互聯網與外界通訊、建立其生意網絡的機會 (MacGregor 2010d)。從印加黃金駱馬到澳洲樹皮盾牌、從希伯來星象盤到滙豐銀行信用卡，大英博物館以太陽能設施作結，似乎點出過去人類突破困境的力量，驅動大眾從眼前的紛爭與不義看到未來的希望。

透過器物流佈於不同地域的生命史，大英博物館與公眾分享了器物本身的物料、製作技術與功用，申論不同文明如何賦予器物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其建構的知識試圖回應全球化時代的困惑，投射宏觀的視野，鼓勵公眾從自身經驗出發，理解人類共享的喜樂與恐懼、渴望與堅持……由此思考我們何以為人、又如何繼續編寫人類世界的故事。換言之，知識不是平鋪直述的史實、也不是容不下任何爭議的資料，而是經過編輯與詮釋所提出的論點與思考。論點與思考或因人而異、或隨時而變，唯其不可確定性卻鼓勵大眾參與其中，反覆論辯價值觀點如何轉變、又緣何而堅持下去。博物館提供知識的意義就在於尋求理解，啟發多元思考。

回應新博物館學的倡議，「世界歷史百物誌」計劃可視為大英博物館反思藏品的研究如何裨益當代社群，因而提出以知識跨越族群、國界與生活經驗的界限，與觀眾討論人類共同的命運。計劃勾勒過去文明的走向，呈現博物館工作如何以當代的視野思考過去，利用過去的文化資源邁向未來。顯然，考據翔實的策展構想並不同沉悶枯燥，也未必遠離當代社會。作為知識生產的平台，文博機構——不論是藝術館、歷史博物館抑或科學館，其建構的知識並不局限於藝術史、考古學或人類學等某一學術框架，而是從多視點、跨學科的角度回應當代文化發展、社會需要，關鍵在於博物館是否確切理解其藏品的價值與意義。

借鑑於此，香港博物館如何思考自身的文化定位？如何理解所謂「中西薈萃、華洋雜處」的城市文化——究竟是不中不西只得皮相的混雜、抑或混雜中自有其盤根錯節的脈絡？曾幾何時，五湖四海的中國人、蘇格蘭人、葡萄牙人、巴斯人、猶太人、尼泊爾人都在我們的城市留下其印記（丁新豹 2014）。博物館如何講述這些人的故事，如何透過館藏將這些不同的觀點與想法跟當代社會分享？

博物館如何推動社會改變？

當博物館嘗試與不同社群分享知識時，意味著其工作從物的關注擴展至對人的關懷。人類學學者 James Clifford 提出博物館必須成為「交流地」（contact zone），確保人人參與其中，尊重彼此的不同意見（1997：192–193）。他的觀點在博物館業界引發不少迴響，「社群參與」頓時變成業界的時髦術語。在香港，任何活動一旦招徠群眾目光、人人爭相參與，就成了理所當然的「好活動」，不枉主辦單位與贊助機構幾番努力。可是，我們甚少探究那些參與者是誰？有關活動體現了什麼價值與意義？這些價值與意義引起誰的共鳴？參與者如何解讀它們？他們是否有機會與主辦單位及其他人一起討論活動所觸及的價值與意義？博物館需要觀眾，因為博物館的藏品有其價值與意義，假使無法與人分享、無法得到社群認可的話，價值與意義就無以流傳下去。假若文博機構只滿足於與眾同樂，或許我們必須再三思考為何需要博物館。

必須指出的是，「交流地」所包蘊的概念絕非「社群參與」、「和諧共融」的同義詞。參與博物館工作坊、與藝術家一起遊戲耍樂，又或欣賞其他文化的展覽，容或招徠不少參與者，卻未必有助博物館實踐其社會責任。Clifford 認為不同社群往往因政治、族裔、信仰、性取向等分歧而遭受隔離，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在於消解大眾的成見與習以為常的規範，容讓社會聽到不同人的經歷與想法，讓不同的價值與意義獲得討論、反駁甚至修訂（1997：192）。一如博物館學學者 Robert Janes 與 Gerald Conaty 指出：

由於當今社會越趨多元與複雜，博物館無法像以往守著一套牢不可改的機制。反之，不少博物館轉而集中從某些故事發掘更深遠的意義。這些故事屬於邊緣社群，如加拿大原住民、移民、長期病患，有關他們的議題往往被主流社會所忽視。為了尋求價值與意義，這類博物館工作同時帶有社會運動的色彩，致力探討社區議題、促成轉變。（2005：3）

其實，新博物館學提倡「社群參與」，旨在討論機構如何利用展覽、教育活動等形式，探討館藏與當代社會的關連，務求推動改變。公眾互動並不一定輕鬆愉快，大多惹來更多輿論的爭議。但爭議卻往往令議題得到更多注視、更多思考，迫使社會不得不面對相關議題，不同社群反而得以互相討價還

價，逐步凝聚成人人都勉強接受的共識。事實上，博物館促進社群參與的關鍵在於聆聽邊緣社群的聲音，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設法令他們的聲音得到更多迴響。唯有包容不同聲音、不同經歷，博物館才足以理解社會的偏見與爭拗，務求拓展討論空間以瓦解其盲點（Sandell 2007：174-181；Abram 2002）。利物浦「國際奴役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正示範博物館如何詮釋幾百年來奴隸販運的歷史，又如何藉以討論當代社會的議題。

2007年，時任國立利物浦博物館總館長 David Fleming 於國際奴役博物館開幕典禮致辭時，表明：

不錯，這是一座肩負使命的博物館！我們藏著一團怒火，致力對抗種族主義。當種族主義者依然在城市大模大樣行走，當非洲、加勒比海一帶以至其他地區依然深陷於貧困之中，這團火將一直燃燒下去（2007）。

回顧利物浦的歷史，不難發現這座城市曾經是奴隸販運的貿易中心。十八世紀時，艾柏特碼頭就見證着逾五千艘奴隸販運船出港，150萬名非洲人被迫流落異鄉淪為奴隸。二百年來，利物浦的繁華泰半來自這違反人性尊嚴的奴役制度（Longmore 2007）。儘管英國已於1807年立法廢止奴隸貿易，但時至今日，大眾依然執迷於對非洲大陸、非洲人的種種偏見，顯見奴役制度的陰影未曾消散。對於非裔人士而言，奴役制度、殖民主義所烙下的痛苦、恐懼與殘害，一直是其祖父母或父母輩最鮮活的回憶。何況，日常生活中，歧視、「白人至上」言論、種族仇殺等依然無日無之（Small 1991）。這段歷史不是一場遙遠的夢魘，而是一道不時隱隱作痛的傷口。Fleming 的聲言表明了博物館探討這段過去的目標在於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種族主義，以及由此延伸的社會議題，如歧視、剝削、不公義等。這段歷史並非某一族群的故事，而是利物浦人、英國人、甚至每一個有意認識社會公義的人所共同面對的課題。

觀眾甫一踏入國際奴役博物館就會看到一堵「自由牆」（Wall of Freedom），（圖一）展示民權領袖、社會運動者、學者與年青人對自由與奴役的看法。後面的常設展廳分別介紹：大西洋奴隸販運時代前非洲的生活方式，以挑戰過去對非洲文化的刻板印象；其次從奴隸的經歷展示奴役制度的殘暴，反思種族主義的因由；及後展覽就廢止奴隸販賣以及民權運動的理念展開討論，邀請觀眾思考何謂「平等」、「公義」與「自由」。為求推動社會轉變，博物館更設立「倡議區」（Campaign Zone），將社會議題呈現於觀眾面前，與他們討論如何維護社會公義。如2011年，博物館與環境正義基金（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合辦「白色黃金：棉花的真實代價」（White Gold: The True Cost of Cotton）展覽，揭露全球棉花生產工業如何侵害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的生態環境、剝削當地人的勞工權益。展覽附設汗衫設計比賽，邀請參與者將展覽訊息帶入日常生活。經過時裝設計師審定，一位利物浦參賽者以標語「成千上萬的童年都花光了！只換來這件糟糕的汗衫」（Thousands of

Childhood's Lost...and all I got was this lousy t-shirt) 勝出。這款設計透過環境正義基金附屬的網上銷售網絡流入市面，引起大眾關注工業生產與童工的議題 (Johnson 2012)。透過展覽、教育活動、延伸計劃等，博物館著力令觀眾瞭解眼前的問題，又創造機會讓更多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爭取公義、樂意成為推動轉變的一分子。博物館建構的知識就從特定族群的經歷擴至造成社會不平等的課題，帶領公眾一同理解世界、促成改變現象的行動。

累積社會轉變的動能，不在於館方上下如何做得更多，而在於如何動員不同社群積極參與其中。2016年，博物館提出「Sankofa 計劃」，⁴ 動員參加者分享他們的歷史。這些社區工作坊提供了基本的博物館學知識，協助參與者書寫自己、家族或社區相關的生活經歷，又指導他們如何收藏相關物件、如何維護藏品 (Ramagavigan 2017)。在此博物館強調的歷史知識看似平凡又瑣碎，微不足道卻又頑強地抵抗著遺忘。如市場食店檔主 Betty Vandy 自 1960 年代始即收藏各式各樣的烹飪書，三百多本珍藏訴說著她如何開展事業，又如何以食物尋回幾代人的非洲回憶 (2017c)。她的個人生命史充滿濃烈情感，勾勒街角房舍的景貌以及當中混雜的文化背景。在時間之流中，知識展現了人性的溫度，也體現不同人面對社會潮流如何作出生命的抉擇。這些抉擇或扭轉個人命運、或推動了社區環境的改變，其意義在於促使個體思考自身與社區的關係以及孕育對未來的願景。Sankofa 計劃所得的迴響，大多著眼於族群身份認同，又或個人如何參與社會行動推動改變 (2017d; 2017e)。

這並非意味博物館輕忽學術研究。事實上，博物館與利物浦大學合辦國際奴役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lavery)，或與其他歐美大學合力進行各項研究計劃。顯然，博物館致力於學術研究與社區回憶兩者互相補足，共同建構出城市的多元面貌。重要的是，博物館並不認為歷史知識必須牢牢掌握於機構手中，反而著意分享技能與知識，鼓勵社群動手書寫自己的故事。知識的另一種力量就在於關懷，關顧每個生命的軌跡、關心不同的聲音如何被紀錄、如何被聆聽。

為正視二百多年前奴隸貿易的暴行，國際奴役博物館開宗明義討論累積幾百年的種族歧視，並由此思考何謂自由、何謂公義，社會又如何抵抗不義。其服務的社群不單單是尋根認祖的「非裔人士」，也不是無從辨別的「公眾」，而是生活於利物浦的不同社群。博物館深明其工作既不能單單由學者專家所策劃，更不能只代表單一群體的聲音。更重要的是，利物浦社群是他們的工作伙伴，而不是被動的參與者。其策劃的展覽、教育活動與社區工作坊往往參考了社群的意見，因應社群需要，思考未來計劃。其宗旨與願景近乎 Clifford 所倡議的「交流地」——發掘社會不被聽見的聲音，締造多元聲音的文化平台。這文化平台從不講求價值中立，庸庸碌碌地簡報資料，以避免引起爭執；更不會自視立場

4 「Sankofa」一字來自西非國家加納 (Ghana) 與科特迪瓦 (Côte d'Ivoire) 通用的阿肯語 (Akan)，意指「回到本源」(利物浦國家博物館 2017a)。是項博物館計劃以此為名，喻意回到社區——歷史事件發生之處，發掘不同社群的聲音。博物館的活動宣傳直指：「假若你不談自己的故事，別人將替你代勞，但故事未必是你原本想說的那一個。更糟糕的是，你的歷史將被埋沒」(2017b)。

超然，不痛不癢地摘取各家雜錦，以示多聲道（Barrett 2011：135–140；Janes 2009）。回到香港博物館的發展，我們毋須急著興建甚麼主題博物館，但卻必須思考現時不同的博物館究竟回應了甚麼本地議題？其所發掘的課題又有甚麼價值與意義？博物館所舉辦的展覽如何梳理這座城市的掙扎與糾結，進而與不同社群共同想象城市更美好的未來？歸根究底，博物館面對的社群是誰？博物館又如何推動社群參與，令我們相信每個人也可以參與文化的討論？

博物館的未來

我們不必強求人人都喜歡博物館，博物館也不可能切合每個人心中所想的模樣。但當博物館被視為沉悶、了無生氣又或毫無關連時，文化就難以透過展覽等公共平台流傳，更遑論與當代社群一起傳承過去，發掘新的價值與意義。那末，我們為何需要博物館？

對同樣的問題，美國博物館學學者 Stephen Weil 提出以下的思考：

假若博物館並非視提昇人們生活品質為營運的終極目標，我們有何理據爭取公共資源？我們需要博物館，其理據並非在於博物館人員賴以建立專長、拓展個人事業，又或喜歡博物館的人因而得以投身其間。顯然，理據也不可能在乎博物館提供了典雅的場地舉行開幕禮、酒會又或五光十色的社交盛會。當博物館不再與社群連結、又或遭人遺忘，我們無法以「其成立源於悠久傳統、早已習以為常」為說辭，爭取公眾支持（轉引自 Weil 1999）。

Weil 的話問正顯示新博物館學對內部機制的省思。博物館如何隨社會文化的變化而更新其詮釋、如何與當代社群對話？博物館學學者相信博物館屬於社會大眾。它有責任成為人人有所參與的知性平台，致力與社群一起討論文化的價值與意義（Stam 1993；Witcomb 2003）。本地博物館有意拓展文化的新想像，就必須思考其定位——究竟博物館如何回應香港文化的課題？如何與公眾連結？如何以文化提昇人人的生活品質？否則，有關博物館發展的討論只能從營運模式、機構績效評定、專業規章等工具理性的層面著眼，卻始終未能將博物館的理念放諸本地文化脈絡，再三思考如何實踐、轉化相關理念，促使博物館機制成為自身文化發展的動力。

丁穎茵現為獨立研究員，其研究範圍在於文化消費及當代社群如何想像藝術。

參考書目（以作者姓氏 / 團體名稱，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Abram, R. J.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History" in R. Sandell ed.,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125–141.

審計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公共博物館服務》（香港：2006）。http://www.aud.gov.hk/pdf_c/c46ch05.pdf。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Barrett, J. *Museums and the Public Spher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

Clunas, C. "China in Britai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in T. Barringer and T. Flynn (eds.), *Colonization and the Object: Empire,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1998): 41–51.

Cash, D. *Access to Museum Culture: The British Museum from 1753 to 1836*. (U.K.: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02).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publications/research_publications_series/2002/access_to_museum_culture.aspx.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Clifford, J. "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in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8–219.

Duthie, E. "The British Museum: An Imperial Museum in a Post–Imperial World" in *Public History Review* 18 (Australia: UTS ePress, 2011): 12–25.

Fleming, D. "Ope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 (Liverpool: 2007). http://www.liverpoolmuseums.org.uk/ism/resources/opening_speech.aspx.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Holden, J. *Capturing Cultural Value: How Culture Has Become a Tool of Government Policy*. (London: DEMOS, 2004).

Hooper–Greenhill, E. "The Rebirth of the Museum" in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0): 151–162.

國際博物館委員會：〈博物館道德守則〉（2006）。<http://icom.museum/ethics.html>。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Janes, R. and Conaty, G. (eds.), *Looking Reality in the Eye: Museum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05).

Janes, R. "It's a Jungle in Here: Museums and their Self-inflicted Challenges" in *Museums in a Troubled World: Renewal, Irrelevance or Collap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57–93.

Jenkins, T. *Keeping Their Marbles: How the Treasures of the Past Ended Up in Museums – And Why They Should Stay The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hnson, L. "Making a Fashion Statement,"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blog* (2012). <http://blog.liverpoolmuseums.org.uk/2012/08/making-a-fashion-statement/>.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Jowell, T. *Government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 (London: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4).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加強公共博物館的節目編排、觀眾拓展和更新常設展覽〉，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7年12月21日會議文件（立法會CB(2)553/17-18(04)號文件）頁4。<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71221cb2-553-4-c.pdf>。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Longmore, J. "Cemented by the Blood of a Negro?" the Impact of the Slave Trade on Eighteenth Century Liverpool." in D. Richardson, A. Tibbles and S. Schwarz (eds.) *Liverpool and Transatlantic Slaver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7–251.

MacGregor, N. "The whole world in our hands," *The Guardian*, July 24, 2004.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04/jul/24/heritage.art>.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Making Us Human (2,000,000 – 9000 BC): Olduvai Handax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2010a).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0pwn7p>.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Empire Builders (300 BC – 1 AD): Pillar of Ashoka,"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2010b).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b00sbrzl>.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Pilgrims, Raiders and Traders (900 – 1300 AD): Hedwig glass Beaker,"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2010c).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b00sqw6c>.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The World of Our Making (1914 – 2010 AD): Solar-powered lamp and charger,”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2010d).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0vcqvb>.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博物館委員會：《博物館委員會建議報告》（香港，2007），頁14。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ion_and_sport/Museum_Report_c.pdf。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An Archive can be Your Story” on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Blog*. (2017a). <http://blog.liverpoolmuseums.org.uk/2017/01/an-archive-can-be-your-story/#more-14885>.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Get involved with the Sankofa project” on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official website*. (2017b). <http://www.liverpoolmuseums.org.uk/collections/research/sankofa/get-involved.aspx>.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Betty and Her Cookery Books” on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Blog*. (2017c). <http://blog.liverpoolmuseums.org.uk/2017/06/betty-and-her-cookery-books/#more-15998>.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Activism Shapes our Collection” on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Blog*. (2017d). <http://blog.liverpoolmuseums.org.uk/2017/02/activism-shapes-ourcollections/#more-15071>.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_____. “Mapping the Past” on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Blog*. (2017e). <http://blog.liverpoolmuseums.org.uk/2017/06/mapping-the-past/>.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吳世寧著：〈藝術館復修·譚美兒：要以藝術講香港故事〉，載《香港01》，2016年2月3日。
<https://www.hk01.com/藝文/4530/再思博物館-藝術館復修-譚美兒-要以藝術講香港故事>。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團結香港基金會：《藝術創新研究系列一：釋放博物館潛力、蛻變管治新模式》（香港，2016）。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media/pdf/OurHKFoundation_Art_Book_web_Chinese.nb.pdf。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Ramagavigan, M. "Sankofa Project" on *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 official website. (2017). <http://sjam.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Sankofa-Project-case-study.pdf>. 檢索日期：2018年4月10日。

Sandell, R. *Museums, Prejudice and the Reframing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cott, C. "Museums: Impact and Value" in *Cultural Trends*, 15(1) (UK: Taylor & Francis, 2006): 45–75.

Selwood, S. "The Politics of Data Collection: Gathering, Analysing and Using Data about the Subsidised Cultural Sector in England" in *Cultural Trends*, 12(47) (UK: Taylor & Francis, 2002): 13–84.

Simpson, M. G. *Making Representations: Museu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1).

Small, S. "Racialised Relations in Liverpool: A Contemporary Anomaly" i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17(4). (UK: Taylor & Francis, 1991): 511–537.

Stam, D. "The Informed Mus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Museology' for Museum Practice" i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2. (UK: Taylor & Francis, 1993): 267–283.

丁新豹著：《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4）。

Ting, W. Y. V. and Watts, E. "Engaging in art: On art ecology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 論文於第九屆國際藝術在社會會議（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rts in Society）發表。

Weil, S. "From Being about Something to Being for Somebody: The Ongo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in *Daedalus* 128(3). (U.S.: MIT Press, 1999): 229–258.

Weil, S. "Museums: Can and Do They Make a Difference?" in *Making Museums Matter*.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2): 55–74.

Wilson, D. *The British Museum: A Histor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2).

Witcomb, A. "'A Place for All of Us'?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in *Re-imagining the Museum: Beyond the Mausoleum*. (London: Routledge, 2003): 79–101.